

刘增杰 孙先科主编

中国近现代文学

转换点研究

刘增杰 孙先科主编

中国近现代文学 转捩点研究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文学转捩点研究/刘增杰, 孙先科主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321-3362-8

I. 中… II. ①刘… ②孙… III. ①近代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
②现代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8593 号

责任编辑: 张安庆

封面设计: 王志伟

中国近现代文学转捩点研究

刘增杰 孙先科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61,000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362-8/I·2551 定价: 3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 录

第一辑 文学转捩点研究

吴福辉	关于文学转捩点涵义的辨析	3
关爱和	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	10
王 飙	近代文学观念理论基础的变动	47
胡全章	嘉道之际:中国近代文学的开端	68
范伯群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	75
孙之梅	新南社:五四前后文学转型的青果	97
武新军	自由主义思潮与文学史重写中的转捩点问题	110
陈改玲	第一次文代会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打造	117
王光明	20 世纪 70—80 年代:“边缘文学”的冲击	130
席 扬	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思潮研究的几个问题	142
张先飞	现代文学西方影响探源性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148
孟庆澍	文学转捩点问题讨论侧记	155

第二辑 文献研究

刘增杰	由资料征集到学术创新 ——小议三十年来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	163
刘进才	关于跨学科研究的史料问题	172
方锡德	小说《惆怅》为冰心佚文的再考证	189
刘增杰	未刊稿的发现——《师陀全集》补遗	215
王 欣	论师陀女性生命关怀的独特性	244
郝魁锋	略论近年来师陀研究的新进展	256

高恒文	“人类”的“灾难”与“寂寞” ——论废名的诗的思想内涵与特征	267
解志熙	感时忧国的历史想象:抗战时期历史剧的 寓意与艺术	281
杜运通	我们社、太阳社比较论	310
王鹏飞	论《西风》上的现代散文革命	328
刘增人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339
刘 涛	任访秋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特色	348
孙先科	历史研究、文本细读、理论品格 ——评《明伦学术书系》	357
编 者	文献开掘与文学转捩点研究(代后记)	371

第 一 辑
文学转换点研究

关于文学转换点涵义的辨析^①

吴福辉

转换点的讨论,在文学史研究当中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问题。从来的文学史叙述都是极其注重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的。“五四”文学是个转变的大契机。从上个世纪一十年代的“文学革命”到二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又是一个小的转折。无论是哪一种转换,文学史在描写其中的各种动因以及新型作家、作品的涌现的时候,历来都不惜笔墨。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间,几次讨论中国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主要也关涉到转换点的确定。比如按传统的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四分法,分界应该在哪里?是仍然保持原来的近代文学从鸦片战争的1840年到五四运动的1919年为止的旧分期,还是将戊戌政变1898年看成现代文学的起始年份,或把新世纪的1900年当作起始年份;而这种现代文学的变动,势必造成近代文学的起始也相应地大大提前,或从明嘉靖年(16世纪上半叶)算起,或自清嘉庆、道光年间(19世纪初叶)算起。至于当代文学是否从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甚至30年代左翼文学开始计算,意见也是纷纭多样的。这里都有着孕育期和

① 此文是作者于2006年9月24日在开封“史料问题与百年中国文学转换点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后略作整理。

转捩点的理论考量在内。到了最近这些年,当文学的“现代性”俨然成为人们的中心议题之后,便引出了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①。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转型的时间,便成了一个大的关节。而单纯以政治事件、历史思潮简单地作为文学转捩点的立场,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在一个时期里,根据中国现代文学与生俱来的政治性、革命性的特点,除了单独的文体阐释需要对“形式”的足够热情以外,大家很简便地就走上了用文化思想分析来取代文学分析之途。难道文学史需要永远依附在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肌体之上?一部浩浩荡荡的百年或百年以上的文学史,就找不出真正的文学转捩点来了吗?

回答说:还真非易事。

我们先要对转捩点有一个共识。我认为文学转捩点的涵义,至少有如下几点:第一,它是文学求新求变的巨大契机,是文学重大的转折时刻。历史上,这种转折的基本模式是“由旧到新”。但仔细考察起来,还有“衰旧→革新”、“较新→更新”、“停滞→貌旧实新”等各种变式。最后这种变式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轨迹中是屡见不鲜的,什么“古文运动”,什么“中兴”,有的就是打着复古的旗帜在偷售着改变现实的“天火”。转折有不同的层次,但所谓文学转捩点的转折,不能小于一个文学史和思潮史的阶段,或一种文体的重大演变阶段。左翼文学的产生可以寻找到转捩点,剧场话剧如何站稳脚跟在大城市生存也可以找到关键性的年代,再小就缺乏“史”的价值了。第二,要以一种有震撼力的文学现象和文学

^① 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导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事件为标志。这种“标志”，应当是一个文学时代、一个文学时期的突出点。所谓“震撼”，是表明这种文学从诞生伊始便充满生命力，是引起各方关注的，是对周边其他文学现象和事物发生推动的。它不会是隐秘不宣，不会是那种在以往的文学史迹中曾经发生过的情景：文学现象、文学事件的意义在当时遭到湮没，是由后人在一定条件下重新发现，加以追认的。就以现代文学观念的改变为例，王国维对西方美学的传入最为今人看重，但如果寻找一个改变的关节点，还是要从严复、梁启超的身上着手。因后者的影响很大。梁启超把历来属“小道”的小说提升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才可能压迫传统诗文使之成为“无用”。哪怕在理论上与“文以载道”关系暧昧，他摧毁旧观念的力量仍是“显”的；而王国维是“隐”的，是事后深远而当时不显著的。我认为，转捩点应当即时表现出它的转折作用来。第三，在这个文学时代逝去后，仍然保有它持久的影响力。这种影响的延续性有的虽然渐行渐远，但作为一种潜在的因素是不可逾越的，就像茅盾的创作模式尽管后来因为被官方化而变成了当代小说发展的某种不利条件，但如果你要谈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兴起与变化，就无法越过他，文学史、小说史不能无视他。有的转捩点所包含的文学现象和事件，可能随着时光的流逝越发显示出它深远的影响力，如海派文学、商业性通俗小说之于今日就是。

文学转捩点不是指整整一个转折时期。我们说晚清是现代文学的转折年代，却不等于说整个晚清是转捩点。王德威说：“我们应重视晚清时期的重要，及其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我所谓的晚清文学，指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以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晚清文学的发展，当然以百日维新(1898年)到辛亥革命(1911年)为高

潮。”^①他始终没有以一种文学事件为标志,来说明晚清文学的现代性究竟是在哪一转换点上开始的。可能他的论述的着眼点本来就不在此,他要强调的是文学开创时期业已存在。

文学转换点也不同于一个转折后产生的文学重要时期。现在我们不管对“五四”前的晚清文学时代的历史地位抱何种观点,说晚清是一文学的转折时期应当不会有太大的分歧。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一套精选文学典型年份来叙述的文学史,它从1898年开头,由主编亲自执笔写了第一本。这一年有严复《天演论》出版,有“百日维新”,有京师大学堂成立,有《清议报》在日本创办,有林纾与人合译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却是第二年出版)。计算下来,文学的事情不多,所以绪论性质的一章题为“1898:并非文学生长的季节”。而书后年表竟是从1892年编起的,这是光绪十八年,该年更无重大的文学事件可言。^②可见作者虽然认定1898这一年重要,但并没有把它看作是转换点。实际上,晚清文学年代中比较重要的一年是1903年。《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第二本选择的即1903年,是经过慎重考虑、论证的。这一年除了梁启超、王国维、严复等都有文学活动外,鲁迅该年在日本剪去辫子写了“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的诗,还译述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刘鹗的《老残游记》,金松岑的《孽海花》(前六回,后由曾朴改续成书),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这些重要小说的代表作品,都是在这一年或出版,或

① 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导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谢冕:《1898:百年忧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在报刊上连载的。这一年还发生了著名的“苏报案”，邹容所著的《革命军》由章太炎作序出版，风行海内外，两人为此事被捕入狱，声名远播。^①但“苏报案”是民主革命的重要案件，无法担当文学现代转换点的重任。众多的谴责小说并没有确定出能辐射出文学现代化功能的转换作品。1903年是晚清文学比较成熟的一年，成熟的文学时期并不等于是文学的转换点。

现在，范伯群和他的学生栾梅健等人在写作《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过程中，更仔细地接触了第一手材料，思考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在今年提出了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的发表与出版，是现代通俗文学和现代文学之始的观点。^②《海上花列传》1892年2月起连载于韩邦庆自办的刊物《海上奇书》，1894年出版全书。《海上花列传》能启示早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各个方面。此书从胡适、鲁迅、茅盾到张爱玲的纷纷看重并详加阐释，已有两文介绍，无须我来饶舌。应当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事件，基本符合文学转换点的条件。1892年和1894年两个时间很容易确定1892年，因一方面此年在先，另一方面1892年创办的《海上奇书》实际上可说是中国现代小说期刊之第一声，后来的晚清四大小说期刊《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都出在其后，差不多要间隔十年以上的样子。持续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但是《海上花列传》的发表，如真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转换点，还需作深入的研究工作。目前仅仅是叠加式地证明此书具有多少条符合“文学现代化”

① 程文超：《1903：前夜的涌动》，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见范伯群：《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栾梅健：《〈海上花列传〉的现代特征》，载2006年5月2日《文汇报》。

的标准,那是不够的。《海上花列传》的现代性,如何与整个晚清文学现代化的过程相通相连,需要严密论证,此为一。上面我所列举的转捩点三要素,其中《海上花列传》与第一条、第三条都相符合,只是第二条即它发表当时的“震撼力”显然还很不够,此为二。或许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还可有新的发现。毕竟在此之前,《海上花列传》一直是作为近代文学的第二流水平的作品来对待的,所有的章节都不见此书书名,只是在“狎邪小说”名义下来论述它。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并不急于下结论。

关于转捩点的概念主要指向“爆发时期”,而不是“成熟时期”,如果用“五四”文学的历史时段来举例,因学术界的意见比较一致,反可以看得格外清晰。本来,《狂人日记》是发表于1918年的,《新青年》全刊采用白话也是在1918年,但历来大家都以1917年《新青年》连续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为标志。为什么?就为了1917年作为文学转捩点的三个条件,色色具备。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1916年先期于《新青年》上发表与陈独秀的通信,已经提出了“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①“八事”的内容与《文学改良刍议》所论相同,次序上有所调整而已。但人们不取1916年,是看到那个“通信”没有提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正宗的思想,没有发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我们大可不必为着胡适本人后来的不断自我叙述(《逼上梁山》、《口述自传》之类)而废其言。《文学改良刍议》在当年确乎振聋发聩,影响远大。连地处偏僻的四川作家巴金、沙汀、艾芜等青年时都是在成都劝业场的“华阳书报流通处”买《新青年》阅读而受到胡适思想鼓

^① 胡适、独秀《通信》,载《新青年》1916年10月1日第2卷第2号。

动、激励的。1917 年成为转捩点的道理正在于此。而 1921 年无疑是文学革命的成熟年。那一年,新文学最早的两大社团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都先后成立,茅盾改革了原先被鸳鸯蝴蝶派掌控的老牌商务印书馆杂志《小说月报》,鲁迅发表了《故乡》,开始在报上连载《阿 Q 正传》,周作人发表《美文》,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和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在上海出版拔了头筹,而鸳鸯蝴蝶派杂志《半月》创刊,《礼拜六》复刊出版后面的 100 期(辛亥前有前 100 期),《晨报副刊》开始独立发行也都在此年。这些文学事实足以支持 1921 年成为重要的文学年,但是,它并不构成文学转捩点的因素。

简单地回顾一下,文学史的发展有线迹可寻。当然这线迹并不是直线的。在大面积的收获以前,总有反反复复的准备时期。处于准备期与成熟期临界上的爆发期,有可能出现文学的转捩点。“横空出世”的转捩点也不是不可能出现,但也只是准备期过于隐蔽罢了。我们如果细细分析鲁迅的道路,他前行的每一步伐也都是有来由的。

转捩点的研究,对文学史的深入探讨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重写文学史”,当今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前的重大课题,便是在新的材料和新的眼光之下,寻找各种文学现象之间合纵连横的联系,以确立我们的起点,确立由古代文学折向现代文学的转捩点。这种确定只能产生于整个研究历程之中,或之末,而绝不能在研究之前。

2006 年 12 月 19 日于冬初京城小石居

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

关爱和

20 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和文学史上成绩与影响最为卓著的人物当推梁启超。1929 年 1 月,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文化巨匠溘然长逝,国内文化名流追忆他襄助变法、历经成败风雨的一生,最为推重的是梁氏以书生救国、以文学新民的功绩。梁启超是中国 20 世纪初思想启蒙运动的主将和文学界革命的陶铸者。

梁启超在 1922 年所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将中国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思想进化分为环环相扣、步步联结的三期。其进化过程像蚕变蛾、蛇脱壳一样,经历种种艰难苦痛而又渐入新境。咸同年间,是中国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的第一期,舍己从人,便有了制械练兵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至民国六七年间,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的第二期,变革政体,便有了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五四前后是“从文化上感觉不足”的第三期,改良道德,便有了新文化运动。作为亲历者与参与者,梁启超的概括是十分真切而富有历史感的。正是这种环环相扣、级级嬗进的历史演化,构成了梁启超不断更新超越自我的时代背景。

作为“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展运动”的风云人物,梁启超是极富有进取精神与生命激情者。这两者使其行为与情感方式带有明显的个性特征而有别于其他维新思想家。梁启超自

言“自己的人生观”是以“责任心”和“兴味”作基础的，“责任心”促使他时时不忘救国救民的重任，“兴味”则使他保持拒旧而求新的心态，“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当康有为自诩“吾学三十已成，以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时，梁启超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梁启超政见多变，但其“维新吾国、维新吾民”的宗旨始终如一；梁启超为学博杂，但其为“新思想界之陈涉”、“尽国民责任于万一”的志向始终如一。不变的责任心与善变的兴味，皆以对民族、国家，对真理热爱的情感为依托。

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是凭借其在《时务报》上所发表的文章而名声噪起的。国人接受梁启超，是他善于以报章文体的形式，以充满激情而流畅平易的笔触把救亡图存的道理条分缕析地传达给读者。东渡日本后，梁启超重操旧业，创办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的《清议报》，1902年，复创办《新民丛报》。《清议报》时期，梁氏始用“饮冰室主人”的笔名写文章。关于“饮冰室”的由来，梁启超在《自由书》的“叙言”中有所说明：“庄子曰：‘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以铭吾室。”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大量译介西方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于从“学问饥荒时代”走来的梁启超来说，如久旱逢甘霖。自言“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朽腹得酒。”由所读西学之书，返观中国新学的各个领域，梁氏深感需重新建构，全面革命之处尚多。所谓“革命”，“其本义实变革而已”。出于更新国民精神和新学建设的需要。东渡后的梁启超，踌躇满志地提出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等一系列的主张，企望在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的前提下，推动20世纪中国知识学术体系

的转型,在民族精神的改造与重建工程中,促进中国政治的渐进和社会的文明进化。

像一位辛勤的拓荒者,流亡之中的梁启超如饥似渴地在所能接触到的著译之作中,为国人采集着思想的薪火,积蓄着除旧布新的希望。被破坏的快意、创造的激情和民族未来的辉煌所鼓舞,梁氏的笔端,洋溢着浓烈的进取精神和爱国情感,充满着叱咤风云的气势和惊心动魄的魔力。梁启超以他特有的真诚与热情赢得了读者,《清议报》、《新民丛报》因此在海内外不胫而走。

梁启超在构筑他新民救国的理想时,充分意识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文学之盛衰,与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新民救国既然是一场更新国民精神、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启蒙运动,文学作为国民精神的重要表征,无疑是“新民”所不可忽视的内容;而文学自身所具有的转移情感、左右人心的特性,又是“新民”最有效的手段。从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需要自新;从促进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又担负着他新的责任。对文学,梁启超抱有“自新”与“他新”的双重期待。

一、文界革命

文界革命在思想与文学革命的链条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能否在刚刚形成的中国现代公共领域内拥有最广大的阅读公众,以清高之理,美妙之文,输入文明思想,培育国民精神,对于思想与学术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是一项穆高如山、浩长似水的伟大事业。梁启超为文界革命设置的目标,就是要在传统的抒写个人情志的文人之文和以经术为本源的述学之文之外,创造出会通中外、融汇古今、热情奔放、悲壮淋漓、自由抒写、流畅锐达的文章新体。而梁本人,